



# 大治引水

□ 叶梅

大治本是有水的。在长江中游鄂东南隆起的丘陵之间,流淌着一条条清冽的小河,绸缎一般缠绕着黛色山岗与金黄田畴,富水河流经大治西部,汇入长江;另一条大治河贯穿南北,汇入湖泊。水波荡漾的大治湖、保安湖、三山湖四季不冻,水量充沛,碧玉镜一般映照着成群飞鸟的起落。受海陆季风控制的亚热带气候,塑造了中国南方鱼米之乡的明媚,也赋予了江南的四季常绿、温和湿润,湖北大治正在其间。古人称大治为“百里黄金地、江南聚宝盆”,这里既有江南水乡的柔婉,却又有深埋的坚硬。

大治距武汉约90公里,记得从我曾居住过的武汉岳家嘴附近出发,掠过东湖的粼粼波光,经武黄高速不久,前方便远远显出起伏的山峦,蜿蜒且硬朗,那正是大治山脉透露出的筋骨。大治这地名来历久远,北宋乾德五年(公元967年),南唐国主李煜将此地设为大治县,名称则取自《庄子·大宗师》中的“天地为大炉,造化为大冶”,寓意“大兴炉冶”。

这片土地的宝藏经大炉熔化冶炼,与哲学巧妙会合。

我第一次站在被称作“矿冶大峡谷”的边沿,弯腰俯瞰那四百多米深的矿坑时,虽然早已得知这深坑的由来,但眼前带有锈铜的黄褐岩壁以及奇幻一般的垂直深度,仍然令人大为吃惊。而来到另一处著名的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之后,更不能不为4000多年前夏商周时期的井下开采和鼓风竖炉炼铜先进技术而惊叹不已。

大治被考古专家认为是华夏青铜文化的发祥地。

大自然对大治的馈赠格外厚实,铜、铁、金等矿产资源富集,聪明的人类很早就开始在此采挖,从现有的史料和传说里可以得知,大治的采矿活动从夏代萌芽,商代初具规模,至西周至春秋时期便发展为集探矿、开采、冶炼、运输于一体的复杂产业体系。其技术成就和资源输出能力,达到了商周青铜时代的顶峰。那时发明的群井与短巷联合开采技术,直达地下的竖井,采用榫卯套接的木支护结构,不仅牢固了井巷支护,还可排水、通风。更令人叹服的是,鼓风竖炉可将冶铜温度提升至1200℃,纯铜纯度达93%以上,炉渣含铜量仅0.7%,几乎接近现代排放标准。

中国青铜文明的格局沿着长江水系漫延开来,而今在武汉盘龙城、西周宝鸡弓鱼国墓地、随州曾侯乙墓编钟等地发现的青铜器,均被证实其铜料来源于大治铜绿山,其冶炼工艺已在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。

而今,那些依稀可见的采矿凿痕和堆积散落的泛着绿光的矿渣沉默着,但你可以想象,它们被多少人触摸过,有多少无名者的指纹,以及他们的汗水流过的气息,隐藏在肉眼看不清的纹理里,而那正是上古时期以来人类活跃的实证。

大治的冶炼史,透射着中国的文明史,从夏商周时期直至当代,大治以“中国铜都”闻名,其冶炼技术和产业规模延续了数千年。

大治的水也为大治支撑了数千年。

## 二

上善若水,大自然离不开水,人类离不开水。冶炼也离不开水。

一个民间传说并非捕风捉影,它们好比隐秘的索引,可将人们领入历史的深处。从大治的传说里可以得知,南朝宋武帝刘裕在此铸兵器并葬衣冠于铁山,所谓“铁山埋剑”。隋唐时期,隋炀帝杨广在铁山南设十炉铸造五铢钱,使大治成为江南货币铸造中心。从那时起,一年年的,流经矿山的河水便带着赭红色的矿砂,在青石间冲刷出深浅不一的凹槽,河谷深处的冶铁作坊,水轮转动的吱呀声,混合着斧凿砍伐的脆响,长年经久不息地回荡在山野里。

唐代之后,大治从采铜为主转向采铁,并设立了采矿和冶炼的专门机构,好比是现代的钢铁厂,却叫了一个堪比书院名称的“青山场院”。青山二字表明,那时的矿山仍被青翠的树木覆盖着,山间流淌着朝向长江的潺潺溪水。

南宋留有岳家军在大治“劈山开矿、锻造大治之剑”的传说。南宋名将岳飞曾带兵驻扎鄂州(今武昌)。在武昌区与洪山区交界的沙湖东南角,有一处岳家嘴,过去我家住武昌时经常路过,最初以为岳家嘴只是过去渔民的地名,后来才得知却是因岳家军驻扎于此而得名。沙湖连通长江,水域开阔,南宋绍兴四年,岳飞收复襄州六郡后,为巩固长江中游防务,在岳家嘴设立了水军训练基地,打造楼船、艨艟等战船,演练水战战术,同时将大治作为重要的兵器供给地。《大治县志》中有岳家军“屯兵于姜桥,采矿于龙角”的记载。考古发现,大治陈贵镇铁炉庄为岳家军兵工厂遗址,出土大量宋代兵器残件及冶炼遗迹。证明岳家军曾在铁山、铜绿山等地设立冶铸作坊,利用当地“块炼铁”技术打造兵器,史称“大治之剑”。这些利剑刚柔并济、削铁如泥,成为岳家军克敌制胜的利器,岳飞威震四方的丈八铁枪,便是在此经过“九炼九淬”锻造而成的。

大治之剑,由大治之铁,经大治之炉,又经大治之水,九炼九淬而成。“冻死不拆屋,饿死不掳掠”,被老百姓深深拥戴的岳家军纪律严明,精忠报国,令敌军闻风丧胆的大治之剑与之相配,寒光凛凛。那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光芒,“待从头、收拾旧山河,朝天阙。”

## 三

大治的铁山与溪河,浸透了近现代半殖民地中国的屈辱。

19世纪末,中国面临军事工业原料短缺的困境,进口钢材占到国内需求的80%以上。湖广总督张之洞将目光投向大治,在武昌设立了湖北铁

局,统筹汉阳铁厂、大治铁矿及马鞍山煤矿,引进蒸汽动力凿岩机、空气压缩机等设备,一下子让开采效率较传统人力提升了20倍。大治铁矿成为中国第一个用近代技术开采的大型露天铁矿,其产量在1896—1934年间占全国机械开采总量的60%以上。但尽管张之洞的开发具有抵御列强经济侵略的意图,却因清政府腐败及技术依赖,最终仍未能摆脱被外资控制的命运,核心设备及技术全由英、德工程师掌控,中国工人仅能从事繁重的基础劳动。

而掠夺式开采导致矿山周围的生态开始急剧恶化。

日本自19世纪末通过不平等条约逐渐渗透,1899年迫使清政府签订《煤铁互售合同》,以低价锁定大治铁矿石供应,合同规定每吨矿石仅售3元,而“一战”期间国际市场价高达20元,并派遣日籍人员常驻矿山监督开采。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大治后,成立“大治矿业所”,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强占汉冶萍公司所属矿山及周边民田,将矿区变为军事管制区,周围架设高压电网,设立碉堡岗哨,强征约1.4万名中国劳工(含战俘和沦陷区平民),实施法西斯式管理。矿工出入需搜身检查,稍有反抗即遭枪杀或活埋。铁山地区因此留下了日军屠杀平民和矿工的“万人坑”“血水塘”。

日本军队为了“以战养战”扩大侵略,疯狂地实行掠夺式开采,采取不分昼夜的露天与地下同时作业,而且只开采高品位矿石(含铁量超60%),致使大治铁矿开采寿命至少缩短50年,优质铁矿几近耗尽。并导致废石随意堆积,矿区塌陷、地表变形,狮子山采区因过度开采形成深444米、面积108万平米的“亚洲第一天坑”,周边堆积废石3.7亿吨,方圆数里水土流失、土地沙化,寸草不生。

不能忘怀的是,日本军队通过汉冶萍公司的债务链条,将大治铁矿变为其钢铁工业的“海外原料基地”,累计从大治铁矿掠走1550.8万吨铁矿石,占1893—1945年总产量的74%。而在大治掠夺的大部分铁矿,直接运往日本八幡制铁所制造杀人的武器,军舰、坦克、枪支、刺刀,转过头来用以杀戮中国人。

夺中国之铁,溅中国人之血。何其悲惨?1945年日本投降后,矿工们愤怒地拆除日军碉堡,在矿渣堆上竖起了“永记国耻”纪念碑。

然而,山里的溪水载不走那些伤痛。大治的水,不再洁净了。

## 四

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5年,大治铁矿重建,成为武钢原料基地,为铸起中国钢铁脊梁,大量的矿石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武钢,在那里化为铁水,化为坚钢。但这片河湖交叉之地,居然没有水可喝了。

历史的伤痛是那样的深,被污染的水沉疴已久。

21世纪初,大治市作为湖北省重要的工矿城市,用水成为最大的难题。虽然河流就在身边,但细碎的铁屑沉积在水底,又漫进港汊,在水草根部结成铁壳,芦苇叶片上总像是蒙着一层洗不净的褐灰。青山不再,河岸边郁郁葱葱的森林已经消失,飞鸟走兽也都早已远走他乡,另择良居。雨水冲刷着毫无遮拦的山坡,将更多的泥沙碎矿带入河道,流水带着大风都吹不散的矿石腥气。检测显示,大治湖的沉积物砷含量竟高达266mg/kg,远超未受污染湖泊的数十倍。鱼类在这里难以生存,从66种锐减至27种。

孩子们被严格禁止在湖边戏水。

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?从前,这里的人们主要以大治湖作为水源,后来不得不改饮井水,但地下水位不断下降,水井也逐渐干涸。后来到了夏季,只能靠政府派洒水车送水。有那么些年,大治不得不向黄石市“买水喝”,但黄石市自来水公司转供的长江水,日供能力仅5万吨,远远满足不了大治城乡的需求。

大治干渴。

今年夏季,我们来到大治,听到从前缺水的介绍,但眼前看到的却是青山绿水,与生态恶化的描述截然不同,而且饮用的水清甜洁净,便迫不及待地问,如今饮用的水是从哪来的呢?

引来的。大治人也迫不及待地回答说,从阳新那边引来的。

原来,在水源窘迫的2015年春,一群“劲牌”人铺开了引水的蓝图。领头者叫吴少勋,他1956年出生于大治一个农村家庭,18岁参军入伍,在部队熔炉六年时光里,磨砺出坚韧踏实、不偷懒、肯钻研的品格。从部队转业回到大治后,他从纱厂到酒厂,当了多年工人,也掌握了好些技能。1987年,他接手濒临破产的酒厂,凭着一股子钻研劲儿,踏遍湘鄂赣的深山,在南方民间药材泡酒的习俗中得到了启发,创出了“中国劲酒”的响亮品牌。

“劲酒虽好,可不要贪杯哟”,这句令人喜爱的广告语,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,也奠定了劲牌健康产业的底色。

为寻找符合“四季长流、百公里无污染源”的酿酒水源,劲牌选址小组曾踏遍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崇山峻岭,最终在阳新县王英水库(又名仙岛湖)旁,发现了从天然洞溶洞里涌出的双龙泉,恰如大自然为酿酒人准备的玉液琼浆。2015年大治遭遇罕见干旱,缺水的情况益发严重,吴少勋带着矿泉水瓶走遍城乡,瓶中浑浊的水样与双龙泉的清澈形成刺目对比,“酿酒需好水,百姓更需好水”,他要把好水引进千万百姓家。

从仙岛湖起步,投资9亿元、日均供水20万吨的阳新引水工程在劲牌人的努力下得以开工,水管如银色的绸带,顺着山势向西北延伸。凿岩机穿透岩壁,隧洞每推进一米,引水的希望就多了一层。跨过丘陵的褶皱,穿过稻田的绿意,避开村落的屋舍,2017年1月,第一股清水顺着管道流进了大治水厂。这股来自双龙泉的一级饮用水,从此顺着管网流向千家万户街巷人家,带着青山间的凉意,也带着劲牌公司饮水思源,回报社会的情意。

经过山体过滤与管道净化双重屏障的泉水,水质经检测竟比原水更优,不仅让酒厂车间清水盈盈,更让大治百万居民从此喝上了清甜的水。

## 五

听了“引水”的故事,不由对劲牌这个从地方小厂成长为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健康企业心生敬意。领头人吴少勋曾先后获“全国五一劳动奖章”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等称号,从乡村振兴到灾害救助,从中药种植基地到社区养老中心,这家以酒起家的企业,把社会责任酿成了事业的底色。截至2024年,劲牌的公益捐赠已达37.21亿元,四次获得“中华慈善奖”。

中华大地上,从来就有慷慨大义,友好相助,在硬朗的大治自成风尚。

恰是七月艳阳,我站在一条绿树拥簇的小河旁,河堤草坪上盛开的小花构成了“生态优先”的醒目大字。只见河里的水不再泛黄,曾经的污水口被石块与草木封堵,茂密的芦苇丛中,不时有成群的水鸟飞起,鸟儿的翅膀掠过水面,牵起细碎的涟漪。埋在地下的管网里流淌着涓涓泉水,乡村的压水井成了怀念乡愁的打卡点,田地里的禾苗翠生生的。大治湖通过“以渔治水”,生态得以修复,鱼儿种类恢复至66种。

大治的引水,引来的不仅是清泉,还引来了爱和生命的美好。

矿山人曾一年年地用蛇皮袋背着泥土上山,在被遗弃的硬岩废石场上种下耐旱的刺槐。石头缝隙里扎根的树木,十年后连成万亩槐花林,每年四月,雪白的花瓣落在曾经的矿渣上,形成石头上开花的奇观,也成为亚洲最大硬岩复垦基地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馆以沉浸式展览,再现古代矿冶智慧。曾经昏天黑地的工业区,转型为黄石国家矿山公园,市民们在这里散步健身,唱歌跳舞。水轮遗址旁立着生态监测牌,孩子们在昔日的废石场上奔跑,他们脚下的每一块石头都可能带着铁火的记忆,传递给奔跑中的孩子。

那坑壁上的刺槐林,在灰黑色的岩石间,绿色的枝叶倔强地伸展着。当年矿工的后代成了护林人,说起跟前辈们一起种树仍感慨不已,这些树是种在石头缝里的,每一棵都要先凿出半米深的坑,填上土,再浇上几十桶水,活下来真不容易。但如今,刺槐林给山体披上了绿装,风一吹,树叶沙沙直响,千年前的“青山场院”仿佛就在这树叶的低语中,被真切地唤回。

大治干渴。

今年夏季,我们来到大治,听到从前缺水的介绍,但眼前看到的却是青山绿水,与生态恶化的描述截然不同,而且饮用的水清甜洁净,便迫不及待地问,如今饮用的水是从哪来的呢?



山水小品(国画) 杨茂宗作

## 捕捉公园里的诗意 ——读阿毛诗集《公园记》

### 文艺评论

□ 李俏梅

萧红在《回忆鲁迅先生》一文中写道:“鲁迅先生说:‘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……一进门分做两条路,一条通左边,一条通右边,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的,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,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。’”鲁迅先生对公园的描述极其有趣,高度抽象了公园的结构特征,可以看作是有心去逛而抽不出时间之后对于公园的一种调侃。

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,哪怕是最洋派的城市上海,公园也是不多的。现代公园最早产生于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后的英国,是城市化进程中对于“田园城市”的向往的产物,也是一个非常有意味的现代城市公共空间。公园对于中国是一个舶来品——中国自古以来有很多园林,但那多是“私园”,有钱人的私家享乐空间——直到1905年,据说才有无锡的几个乡绅,将几处私家小花园联结起来,又加了些小桥流水形成了一处对外开放的公园,并命名为“公花园”,这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个公园。

武汉最早的公园当是1929年正式建成开放的汉口中山公园,也是在私家园林的基础上建成的——可见中国公园的文化品格其实是中西合璧的,引入了公园的概念之后,建什么风格的公园就是自主的了——关键必须是public的,向公众开放的。我记忆中很长一段时间,公园还是要收门票的,随着经济的发展,现在大部分公园是免费的了——实现了对于市民、公众纯福利性的服务。而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,武汉公园建设的步伐相当亮眼,超过很多一线城市包括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,深圳的公园据说数量上已经超过了武汉,但窃以为综合魅力包括历史文化的含量、规模等,还是难以跟武汉比的。武汉公园的数量也已经相当可观,目前已逾900座,在向“千园之城”进发,这使得武汉变成一个非常美丽宜居的城市。

为什么要写《公园记》这样一本诗集?阿毛自述是在解放公园的一次诗会触动了她,使她萌生出“为武汉的每一座公园写一首诗”的愿望。公园题材的的确是一个新颖别致的题材,阿毛之前并未有人集中书写过。作为现代城市空间,公园具有开放与包容、自然与人工、动态与静态、孤独与聚集等复杂的二重属性,又是城市历史与个人记忆的载体,是一处丰富、独特的诗意空间。2021年以来的三年时间里阿毛孜孜不倦地跑了很多公园,再加上之前所作的50多首,构成了《公园记》300多首诗歌的由来。

阿毛的公园诗表现了公园空间的这种丰富性和二重性,特别接地气,有在场

感和画面感。花草在诗里出现的频率相当高,如她写《府河郊野公园》:“她们摘了几朵桑椹、几朵樱桃/放在大滨菊挨着的赛车上/紫色酢浆草、蓝色婆婆纳/看着半空的红帽/高空的风筝/孩子们的草地午餐/摇曳着光影和花香”,令人想起孔夫子的教诲:“多识草木鸟兽之名”。花草之名本身自含诗意,亦是现代园艺发展的标志。所有这些花木,包括公园里的咖啡屋、时见鹿(书店)、游乐场、美术馆、展览馆、露营帐篷、无人机等现代设施都是我们生存环境的一部分,这些司空见惯的现代之物,如果从文化的眼光打量,就显示了生活的变迁和文明的发展。除纷纭的现代事物之外,公园亦是历史古迹密集的所在,不少公园就是以古迹为核心的展示。在阿毛的诗里,我们看到很多武汉的历古古迹和古老的地标,包括黄鹤楼、晴川阁、鹦鹉洲、琴台、宝通禅寺、无影塔、古德寺、问津书院等,它们与周围的现代事物已经融为一体,形成一个相当综合的历史文化体,是自然美景、文化古迹与现代生活方式的交融。阿毛通常用一种后现代的并置手法展现这个文化综合体,如《古德寺所见》:“露营装、超短裙、勾肩搭背者禁入/但古德寺仍成为/时尚T台/恋人秀场/……少数人以跪拜双膝与扫描二维码/表达虔诚/供奉香火的场景/在自拍或者他拍的抖音里/像前世……佛脚,或伫立的风/为寺香染上世俗而羞愧”。诗人首先说庄严的佛教重地有一些行为规范,衣着上有一些要求,但现代生活风尚是挡不住的,富有侵略性的,这个古老的寺庙依然成为了“时尚T台/恋人秀场”,有人甚至跪拜的时候还要自拍或他拍抖音,表达虔诚的香火钱也是“扫描二维码”付款的,这样的场景是绝对的现代。然而不管怎么现代,人依然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,依然只能求菩萨祈福“所愿成真”,这是与前现代共通的个体命运。诗的最后说“为寺香染上世俗而羞愧”,如果说老百姓的求佛里有世俗的欲望,倒是不必羞愧的,因为每一代人都会祈求更好的生活与命运,但如果佛寺本身有过多敛财的欲望,那就真的是滚滚红尘连庙宇了,如《今日的宝通寺》所写:“敲木鱼者——身心不空/藏着旧时衣裳里的俗物”。总之,在文化古迹的描写中,我们看到诗人“融合了古意与现当代”的书写(《以晴川阁为背景的摄影》),恰切地表现了二者“之间的对峙或疏离”(《梦时代与宝通寺》),也或隐或现地表露了诗人的价值观和批判性反思。

总之,作为现代公园诗的第一位专业书写者,阿毛的想法和行动力都令人佩服,很多公园的景观在她笔下如在目前,也足见诗人阿毛对武汉的深挚感情。我甚至想,把阿毛的一些诗句镌刻在武汉的公园里,真正实现“让诗歌装点公园”,或许是值得期待的。

## 襄阳三碗面

□ 明